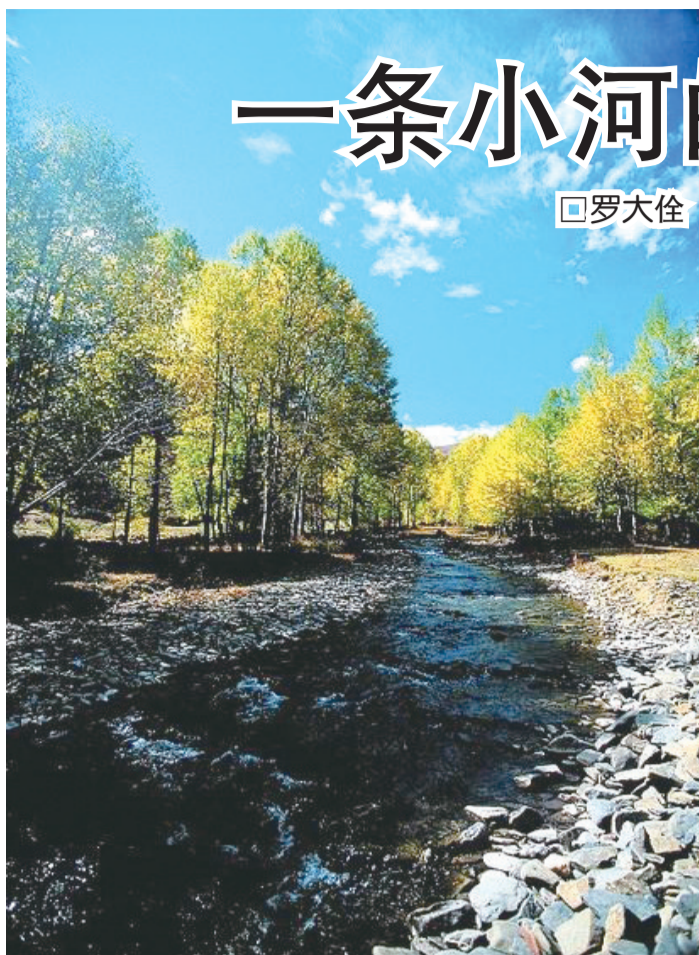


一条小河的变迁

□罗大佳



家乡洪雅县有一条小河,名叫“牟河”,位于瓦屋山下青衣江畔的深丘地带,是洪川镇共同村唯一的一条河流。

河流是一个村庄的心脏,也是一个村庄的乐园,因了这条河流,牟河坝在全村的位置举足轻重。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河水清清,微波荡漾,一年四季,碧绿澄澈。

小河的上端有一口水井,人们叫它“牟河井”。井水水质不错,凉悠悠、甜丝丝的,人们到县城赶集回来,路过井边时,都会蹲下身子,双手鞠一捧井水,喝个痛快。小河的下端有一座磨房,名叫“石谷坎磨房”。磨房里有两扇又圆又厚的石磨,一架水冲打米机。当河水涨满的时候,闸门一开,“咕噜咕噜”的磨面声,“哒哒哒哒”的打米声,是儿时最爱聆听的旋律。

因了这条小河,干旱之年牟河坝也没受多少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洪雅的总岗山水库还没建成的时候,干旱之年天不下雨,田里的禾苗奄奄一息,人们就用手推车、脚踏车,将河里的水运到田里,确保了秋季的收成。因为这条小河,不管多穷,姑娘们都愿嫁到牟河坝,牟河坝没有一个小伙子会打单身。

小河最快乐的季节是冬季。生产队没有在河里养鱼,可每年河里都有捕不完的鱼。冬天是农闲季节,生产队用门板在小河的入口处将河水挡住,把小河里的水放到脚肚子深的时候,就组织生产队的男人们下河捕鱼。大人们捕捉的鱼属于集体财产,生产队队长当天就安排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挑到县城集贸市场销售后,将钱交回生产队。参加捕鱼的男人们,则按人头记工分。大人们捕完鱼上岸后,妇女和小孩才可以去浅水处捕捉,捉住的小虾小鱼归家所有。偶尔捉住了一条漏网的大鱼,那就“发财”了,当天晚上的饭桌上鱼香味一定飘出很远很远。令我们这些小娃奇怪的是,当天明明看见鱼儿已被捉完了,第二天下午到已被灌满河水的河边一看,河里仍然有鱼儿跳跃。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村委会引进外来资金,建起了芒硝厂,村民们为了增加耕地面积,砍掉了田边的山林,开始开垦山林,种植庄稼时也不满足于过去的产量,为了多产粮食,打农药、施化肥,喂养家禽畜开始使用添加剂、催肥剂,只要能够变钱,只要来得快,什么都去做。更有一部分村民把土地承包给别人,自己外出打工。这时牟河坝的天空不再蔚蓝,远处的黑烟不时飘来,小河水流量

开始减小,河水不再那么碧绿。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离开牟河坝,被招聘到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工作。因忙于工作,很少回家。几年后回去时,见家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人买了彩电,修起了楼房,安起了自来水,机耕道实现了家家通,收割机、脱粒机已经普及,石谷坎磨房被孤零零地遗弃在那里。但天空的黑烟更浓,种田的村里人只剩下了老人和妇女。小河杂草丛生,淤泥堵塞,河水从绿色变成了黄色,小河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2004年7月我调到雅安市委宣传统战部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江西省林业厅工作,回家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了。有一年冬天我利用出差机会回去看望老父老母,村里的机耕道已经变成了水泥公路,楼房比以前更多。但乡村的新鲜空气已经不复存在,光秃秃的山头杂草丛生。国家虽然为农民取消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皇粮国税,但年轻人外出打工不归,家乡田地一片荒芜。回到家里,正陪父母聊天之际,忽然感觉远处一声轰鸣,地下晃动,家里的玻璃窗“咯噔噔”抖了几下。我以为发生地震了,母亲告诉我,这是离我们家八九华里的一家芒硝化工厂在放炮。这家芒硝化工厂是县里的龙头企业,纳税大户,但几个烟囱伸向苍穹,滚滚的黑烟不停地飘向天空,炼出的矿渣小山似的堆满川藏公路两旁,地下的矿洞进一步延伸到了我们和其他几个村里……正说话间,一群老人和妇女在门外的机耕道上嚷嚷着,母亲说他们是相约着去村公所领钱。原来这家芒硝化工厂每放一次炮,就发给村民一些补贴,每次也没多少,每家每户也就几十元钱而已,有时还用一些毛巾、脸盆、水壶等生活日用品代替,乡亲们也不计较,觉得有总比没有好,不拿白不拿。我心里是说不出的凄凉和悲哀。于是去了儿时带给我无数快乐的小河边。

当年石谷坎磨房已被撤掉,机器和石磨不见了踪影。小河已被改作无数水田,承包给了一位儿时的伙伴,田里是收割稻谷后还没有腐烂的谷粒,水田之间有一条小溪在汨汨地流淌,仿佛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一条河流。抬起头来,河堤上一群不知名的小孩正在玩耍,他们没有了我们儿时打水漂的地方,只是拿着电动玩具在我追我赶地嬉戏打闹。仰望天空,天空中依然是雾霾密布,没有一只鸟儿飞过。山林没了,鸟儿没了,魂牵梦萦的小河没了,我的眼中噙满泪水,不知道我的家乡要迈向何方,而家乡的小河,只能成为留在我心里的风景画。

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回家乡的时候,一位在县委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说近几年来县里采取严厉措施整治生态环境,封闭了损坏生态环境的矿山煤矿,关闭了几十家不达标的污染企业,那家芒硝化工厂已经迁出了境内。听到这些消息,我忽然想起了我儿时的小河,梦中的小河,它是否也脱胎换骨恢复了模样?于是三下两下吃完饭,就往牟河坝赶去。

故乡的水泥公路已经加宽,不时有小车擦身而过。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田野里的稻穗一片翠绿,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阵阵微风飘来农家的菜香,开垦的荒地如今变成了果园。许多外出打工的儿时伙伴已经回到了故乡,正在干农活的他们时不时地和我打着招呼。老人们在院坝里含饴弄孙,格格的笑声写着他们的天伦之乐。

那条我以为只能在梦中相见的小河,稻田已经远去,河流恢复了昔日的模样。

且行且思且成长

□天下尘埃

为期10天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采访活动结束了,回程的行囊比去时沉重许多,除了沿途带回的文献资料、材料,更多的还是出行的所见所闻所想,收获丰盛,感想太多,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起笔。

安徽三日感触最深。出发伊始得知本团主要是调研农村改革成果,对于生长在城市里的一代,印象中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近郊农村都已跟城区无异,心里不由得疑虑,去农村到底看什么?

足迹、纸笔和镜头,在安徽大地上延伸。从第一站的岳西县,农民依托高山自然条件,从小种小试到走出一条以茭白主导的产业致富之路;再到霍山县利用自身山林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旅游致富的山区崛起之路;最后到小岗村,村民不坐等观望,敢于通过自己来创造和改变历史的开拓发展之路……禁不住想给这片沃土上的人们点赞,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品质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忍不住想给地方的基层干部点赞,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没有基层干部的付出,没有他们的带领和推动,没有眼光的长远和行动坚持,也难带领大家从艰难中走出一条阳光大道。但最应该的,还是要给安徽精神点赞。

稍事休整,马不停蹄地赶往浙江。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难道还需要扶贫?!也许没什么可看的吧?可是当下姜村曾经的村景照片展现在眼前,不得不相信,此刻身处的村道洁净,河水清澈、民居精美的地方,的确曾是浙江全省最穷的村子、历届省委书记的工作联系点,如今数年过去,翻天覆地的变化,已不可同日而语。随后去到鲁家村,参观由一辆小火车牵上致富路的村庄,蓦然发现时时标榜身处浩瀚互联网的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直到亲眼见证观念创造的奇迹,才知道现实如此奇妙。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能凭借想象描绘出二次元空间的我们却很难有人能像鲁家村的支书一样,有了创意便付诸实施并收获实效,倒是叫人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来——“实干兴邦”,莫如一。是。

余村堪称乡村振兴的典范,一路走来,都是山川美景。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都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展现。采石场旧址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不难想见是怎样的痛让余村人舍弃了曾经短视的选择,山重水复之时是党中央的肯定让他们坚信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最终迎来了新余村的柳暗花明。

采访团进入湖南湘西自治州时,行程已近尾声,两天半的采访很是紧张,但也感慨良多。在花垣县十八洞村座谈时,一位青年介绍自己的经历,他原本是个野生野长的孤儿,成天除了醉酒无所事事,后来扶贫工作队进驻村里,反复多次做思想工作,又组织相亲大会解决他的个人问题,现在夫妻俩通过养蜂勤劳致富。当他说出一句“我是被扶贫工作队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孩子”,众人无不动容,令人欣



找人家了,却总是说不出口。

父亲胡乱吃几口饭,默默地又到门口编薄篱子去了。父亲的手已经被那些彻骨的冷水和凌厉的枝条磨蚀,结了厚厚的老茧。每次洗手时,父亲都是用那些河里的小沙石来擦洗厚茧,低头喃喃自语,这手还能再画像吗?这手还能再画像吗?

日子似乎有点松动了,因为兑九峪街上的古集会又有了。母亲总是会想办法赚点钱过日子,竟和父亲张罗着利用家里的上窑和厦房给来赶会的山里人做饭安排住处,挣些薄利。好在我家的老窑洞是从山岭上挖出来的,窑后面有过去躲避战乱的地道,能住好几个人。

证明也终于开出来了,父亲穿着急急地赶到昔阳县取东西去了。

三

已经进腊月了,家里还没有过年的钱,父亲急了。

父亲从镇供销社里除了几卷红黄绿粉的红光纸,又到村代销店除了几卷红纸、白报纸和颜料,窝在家里,铺在炕上,把白报纸割成四开的长条幅,再画成八条屏的吊屏画,分别印上八个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再分别用扁笔画些花鸟画。把红纸割开写成对联、门联和喜帖。把彩纸割成八开方形,粉黄绿红,四色一对,写上大字:“喜迎新春”,剪好花样图案的腿腿贴上,做成“花红纸”。父亲画吊屏画,写花红纸、对联,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和奶奶做完家务活儿,就坐在炕上蘸着浆糊贴“花红纸”的腿

腿。弟妹妹下了学,也是帮着贴腿腿。我则忙着帮助父亲写对联,全家忙得饭吃不好觉睡不好,却也充满干劲,不亦乐乎。

过了腊月十五,就开始到镇上赶集赶集摆摊,卖吊屏画、对联和花红纸了。街上平时查得紧,不让摆摊。父亲就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地吆喝着卖。周边的村子都跑得差不多了,也就进腊月二十三了,父亲就开始跑西山里了。

西山里离镇上很远,要走近百里路,翻两座山。父亲还不到5点就起床了,母亲怕父亲走夜路不安全,让我陪上父亲走,待天亮了,我再返回来。腊月的后半夜里,月亮似乎很亮,把铁路上的两条通向山里的铁轨照得明晃晃的,把空无一人的公路照得银镜似的发白。我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不敢歇两边,挺着胸膛,直视渺茫的前方。偶尔,从我们背后遥远的地方传来哒哒哒的马蹄声。父亲的眼睛望着前方,说:“儿子,别怕,那是平遥祁县太谷去西山里拉炭的火车的声音,他们也是要早早地走夜路的。”我抬起头,望了一眼父亲说:“大,我不怕。”父亲咧开嘴,呵了一口白气,笑了。我望着父亲嘴巴四周挂满白霜的胡子拉碴,也呵了一口白气,笑了。

下了弯弯的山道,上了河滩边的公路时,太阳已经把四周的树木和田野照得一片金黄。父亲接过我手中的那一包花红纸说:“儿子,你回去吧!路上小心些!”

新的春天来了,正月里尽了,父亲又走乡过镇、进村串户,开始了他的画像生涯。

这年的6月,通过全省的中考,我终于上了兑镇高中。



1978年的父与子

□马明高

那一年的春天,村里还是集体化,人们忙碌着开始在地里劳作了。

父亲是村里惟一的个体户,尽管身体有病,但为了挣钱换队里的工分来养家糊口,也该动弹了。但我能从父亲苍老瘦弱的脸上看出他的不情愿。父亲是一个画匠,十几年来,一年四季在外面走村串户,给人画像。那时候,照相技术在山村窝铺里不是很发达。上了年纪的人照一张像很难。有的老人都离世了,也不见一张满意的留给后人的像。父亲就走村串户,照着一张老幼的全家合影照或一寸照片,拿放大镜放大,拿硬笔尖毛笔,沾上黑炭精粉,细细地画大像。实在没有旧照片的,父亲就看着真人画。画像多为10寸、8寸或12寸的,还有画20寸的,吃一顿饭后,收3块钱,这样的人家,在那时就是很有钱的人了。也有人上门来要画的,父亲就坐在炕上,在窑洞前的小炕桌上为他画像。每个月父亲都是月初出发,走个20多天就回来了。月底再到附近矿区揽活。形势紧了,就连画像的工具和挣下的钱都没收了。父亲实在有些不想出去了。

那一年,我已上了初中。老师们一再强调,明年上高中不再靠推荐了,要凭自己的学习成绩上。我是家中的老大,后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都上小学了。一上学,四个人的学杂费就够喝一壶了,不要说过大年家里一年的那点底子要光花了,再说正月一尽,也该开始交队里的副业费了,不然到夏季领粮时也是麻烦。父亲脸上的愁容再浓,望着全家大大小小的那七张吃饭的嘴,也不得不外出了。父亲背上那装画像工具的包,一手拿着雷锋像框,一手拿着焦裕禄像框,走出院门,下了坡坡,望着我们,一步一回头的,顺着那长长的铁路走了……

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

父亲什么也不拿着,空手回来了。

父亲的眉头总是皱得紧紧的,不说话。母亲和他不知为什么一说话就吵。后来才知道,父亲这次出去画像,在昔阳县被人家把画像的工具和挣下的钱都没收了。人家说:“全国人民都在农业学大寨,你怎么还出来偷机倒把搞副业?回你村里找党支部开证明去!开好证明再来拿你的东西和钱。”父亲老是坐在窑洞的窗前,望着窗外发呆。母亲说:“你就这么天天白坐哩!这日子不过了?”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就从炕上起来,穿上衣服走了。我们下了早学吃完早饭后,正要上学的时候,才看见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天天如此去找村党支部开证明,父亲似乎

很有恒心和韧劲。每天做完这件事后,就上山砍些荆条,拿个小凳,坐在窑洞前,学着编织马车拉东西用的车围子,村里人叫“薄篱子”。爷爷虽然精神有时错乱,骂了父亲骂大队干部,但也要和父亲搭上兑九峪公路上的大马车,到西面很遥远的高庙山,买上些柳条杨条儿,每次都是好几大捆,再搭上那些从西山里拉炭的大马车返回来。若遇不上车,父亲和爷爷便用肩挑着往回赶路。每次回来,父亲都要大病一场。病好以后,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将那些枝条上的残枝败叶一一削净,洒水润湿,然后蹲在地上,一根一根地编织,一日复一日地编织成宽宽的长长的薄篱子。

父亲还是天天早早地起来走了。我上午去学校的时候,看见他垂着脑袋回来,想劝父亲一句别去